

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谢忠强

(运城学院 思政部, 山西 运城 044000)

摘要:对城市社会生活史的概念理解需要从其所包含的基本词语着手。在理解概念的基础上,相关研究实践表明,所谓城市社会生活史,其学科指向应为城市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逐渐成熟基础上的内容交叉。检视目前既有的研究现状,着眼未来发展趋势,“理论建设”、“视野拓展”和“比较研究”等当为今后学界推动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所首要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城市社会生活史;学术研究;理论思考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57(2012)04-0057-05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人们对于自身生活质量关注程度的日益提高,城市社会生活史越来越成为史界关注的焦点。本文拟从城市社会生活史的词义、概念、研究对象、历史和未来等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理论总结与思考,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城市社会生活史的词中之义

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在国内的开展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1],但其概念却尚未明确厘定。从词语构成的角度来看,城市社会生活史是由“城市”、“社会生活”和“历史”三个词语组合而成。因而,我们要想深刻理解城市社会生活史的概念,或可先从其所包含的每个基本词语入手。

(一)城市的概念分析

中国早期的城市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城”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基础上的“防卫设施”,“市”则是社会第一次大分工之后,“劳动者交换产品的地方”^{[2]10}。后来伴随社会生活实践的发展,两者渐趋合一。事实上,城市的出现是与生产分工的演化以及“国家的产生、政治的集聚密不可分”^[3]。然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城市功能的演化以及人们对城市理解视角的扩散,城市成了一个颇

为复杂的概念。如城市社会学从“城市的社会结构、功能和社会特征”等角度出发,将城市看作“在空间上有一定的范围并具有某些特征的社会组织形式”^[4],即“城市是一个高密度异质人口、多种非农业职业、社会联系广泛的发达市场功能与严密的法律规范的区域”^[5]。城市地理学则从地理自然条件对城市经济活动的限制出发,将城市看作“是以空间关系”为主要特征的“广度、密度和顺序”。城市经济学将城市界定为“人口和经济在空间体系下”的集聚。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学则又把城市的产生看作是空间形式的聚合过程,认为“城市”不仅代表了当地的人民,还代表了井然有序的空间,是“一种新型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世界”^[6]。

(二)社会生活的历史研究指向

社会生活有其明确的范围指向,但将其纳入史学研究之后则仁智各见了。乔志强先生认为,社会生活史具体研究的是“社会结构中人们的社会性行为和社会互动过程变迁的历史”,即“从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物质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的表现和演变中了解人们的社会行为的历史演变”^{[5]43}。冯尔康先生则提出用“日常社会生活”来限定“社会生活”的概念,他认为“用‘日常’这个形容词来限制它,使其成为狭义的,即人群在生产、政治活动之外

收稿日期:2012-01-11

作者简介:谢忠强(1980—),男,山东沂水人,运城学院思政部讲师,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的物质与文化生活,这样使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两大部分都突出了”^{[5]28}。常建华先生认为,社会生活主要是指“诸如衣食住行、嫁娶丧祭、家庭宗族、娱乐、信仰、风俗习惯等”民众的日常生活^[6]。钱杭先生则认为,虽然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宗教生活等“都应看作是广义的、互相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的社会生活”,但我们所说的社会生活显然语境不同,而是属于一个特定的范畴,即“社会日常生活”。“按照社会学家的提示,社会日常生活涉及面很广,大致可以包括个人、家庭和其他社会群体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各种消费性活动,如吃、穿、住、用、行、文娱、体育、社交、学习、恋爱、婚姻、风俗习惯、典礼仪式等广泛领域”^[7]。李长莉先生也认为,所谓社会生活就是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8]。然而,与国内的社会生活界定更多强调“微观”与“琐碎”不同,国外学者的理解则更见其“中观”与“联系”。例如,美国学者彼德·布劳在其《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一书中即明确探讨了“社会生活”的内涵,并主张“谈论社会生活,就是谈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故而其对社会生活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人际交往”^{[9]13}展开的。

(三) 历史的概念把握

历史的概念可以“区分为客观的历史和书写的历史两种”^{[10]160}。历史就其本身而言,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这些过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还有一种历史,就是“现实存在的、有生命的、活动的个人,根据每个时代‘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本原的和本真的历史存在),通过对历史资料(史料性历史存在)——不管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进行考察、整理和阐述的方式而展开的,对他们自己的现实性存在的本质、根据和前提——生命的历史性存在形态——进行科学性、反思性、批判性、建构性认识的思维运动过程及其结果,是他们理解并且表现其本质即自己的自由生命、显示其生命运动的一种方式,也是他们理解并且确认其自身的现实性存在的正当性与本质力量的一种活动方式”^{[11]11}。质言之,前者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或曰历史的客体,后者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通过人的研究和认识所形成的一种反映或曰历史的主体认知。在历史的整体概念中,毫无疑问二者应该是统一的。然而,对于历史认识的发展过程而言,人们对于历史客体的把握程度需要依赖于历史认识主体的基本素养。“以往,当我们全力贯注于研究历史的客体而不去探讨主体的认识能力及其力量范围的时候,我们尊奉的‘从客观历

史实际出发’这个正确的唯物主义原则,却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一个哲学的偏见的作用:它似乎在说,只要我们在主观上坚持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就可以在研究实践中排除主观因素的渗透,达到完全客观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而认识主体的主观条件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发挥,则只可能扭曲历史的原貌。多少年来,这种潜在的认识偏见,使我们忽视主体认识能力方面的研究,不敢承认在历史研究中加强主体意识、发挥史家主观能动性的正当性、合理性。”^[12]显而易见,对历史概念的科学把握需要在重视历史客体的基础上,同样对历史认识主体予以高度的重视。

二、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对象

从“城市”、“社会生活”和“历史”等单个词语的含义指向着手,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我们理解“城市社会生活史”这一合成词的含义,但每个具体词语要素的叠加又决不等同于其学科概念的范围指向。城市社会生活史,从其学科指向分析,应为城市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逐渐成熟基础上的内容交叉。

城市史将城市的发展历史当成研究对象,其研究的范围从纵向上,“要研究城市形成、发展的脉络和阶段性”,研究从奴隶社会之后各种社会类型中的城市形态和发展状况及其历史特点;横向看则“要涉及城市的地理地貌、环境、自然景观、园林、工业、商贸和金融、建筑、公用事业、交通、市政工程、科技、文教、游乐、生活、人们的心理、社区、服务、习俗、阶级和阶层、职业、社团、政治、宗教、人口、人物、建置、功能、疾病”,而所有这些内容之间又相互联系、此消彼长,延伸出诸多子系统。^[13]

社会生活史则是研究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段人们各种生活现象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门学问,“其研究对象包括不同社会群体的各种消费行为”及其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具体地说,社会生活史是通史性质的专门史,其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社会生活环境”、“社会群体与社会阶层”、“家庭生活与衣食住行”、“社会教育与社会交往”、“生活态度与生活价值观”等。^[14]

综合城市史和社会生活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对象的重叠交叉部分,所谓“城市社会生活史”即是城市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与其日常生活相关的外在环境。结合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实践进展,大致涉及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 城市社会人群

城市社会生活的主体是城市中的人,因此确定

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对象应牢牢把握住“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人”这一关键要素。当然对于“人”的把握既要研究人的个体属性如“地缘”、“业缘”、“性别”、“地位”等,更要研究城市社会人群或阶层。所谓社会群体与社会阶层,是指根据政治或经济地位划分的不同社会集团。由于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组成,所以社会生活史应着重研究这些不同社会群体与阶层的生活状况及其行为特征。一般而言,社会结构的划分是以经济地位为主要参照进行的,而不同经济地位的影响则体现于所有生活领域中最明显的特征。例如服饰、饮食、居住、器具、婚丧等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不同社会结构的人而言都有不同的标准和规范。此外,在城市化过程中群体经济地位边缘化基础上所产生的如“娼妓、乞丐、城市流民、贫民”等边缘人群更应得到研究者的特别关注。从历史研究的现实观照来看,当前城市化的目标是进一步推动社会的进步以及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但贫富差距日渐拉大、城市社会犯罪依然存在等客观现实的存在,不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同时也理应成为相关学科研究的焦点所在。毕竟我们开展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其目的不仅仅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鉴古知今”,总结历史上城市社会生活的规律与教训,为推动当今城市的发展以及提高当今城市社会生活的质量服务^[15]。

(二)城市社会生活方式

城市社会生活方式是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社会生活史学科讨论的过程中,学界就共同认为:重视对于人类的生活方式的研究是社会生活史区别于社会结构史、社会功能和社会制度史等社会史分支领域的关键所在。作为社会生活史城市空间限定的城市社会生活史更应如此。生活方式既指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按照“一定文化模式进行的服饰、饮食、行旅交通等基本需求的原生性活动(或称为物质生活),同时也包括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婚姻、丧葬、教育、文体娱乐、社会交往、宗教信仰等各种派生性活动”。随着城市人群生活环境的变迁,城市社会生活的方式也经历了明显的演化过程,研究城市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人群的各种生活方式的具体变迁过程、特点、原因和机制”^[16],正是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城市社会生活环境

人生活在环境之中,环境是城市社会生活的场域。城市社会生活环境,广义上指涉城市中自然生

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两个组成部分。城市的自然生态环境包括固有的气候、水文、地貌以及人为设计或改造过的有特定土壤、植物、动物的公共自然环境(如城市园林)等要素,它是城市居民赖以工作、生活、休闲的基础性条件。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一样,其社会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生态环境因子的制约,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换言之,在全球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是备受关注的历史问题,即人类的社会生活史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人类如何适应、利用、改造自然,如何与自然协调、共生的历史。人文社会环境包括政治、军事、经济、人口、民族、社会形态、文化氛围等方面,同样也是人类赖以存在和生活的基础条件。人文社会环境因子与自然生态环境因子一起,共同构成了城市社会的生活环境。

(四)城市社会文化

文化是城市社会生活的时代投影。“还历史以血肉的社会生活研究、揭示社会精神面貌的社会文化研究、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的区域社会研究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三大特征。”^[17]社会生活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社会文化史则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在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社会生活的理论范畴发挥着重要的基石作用”。“社会生活的理论范畴是指在宏观层面上的几个重要概念和问题,也是关注社会生活和研究社会文化史的思考域与切入点”^[18]。质言之,都市文化生活是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却空间地域的横向差异以及时间上的历史性变异,这正是历史发展潮流给城市社会发展打上时代烙印。

三、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总结与思考

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最早是城市史研究的一部分,因此,要想全面了解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过去,还得从梳理城市史的发展开始。城市史学是“以城市历史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虽说人类对于城市史的研究历史久远,但作为史学分支学科之一的城市史学却兴起较迟”^[19]。城市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埃里克·E·兰帕德《美国历史学家和城市化研究》一文的发表为新发展的标志。^[20]相形之下,中国城市史学的兴起则要晚得多,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其后,中国城市史学的发展较快,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也逐渐显露出较为独立的发展

态势。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信息中心于一体的城市,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和重要”,与之相适应,城市史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城市社会生活史也逐渐成为国际史学界备受重视的研究重点之一。^[1]

在中西方研究热潮的推动下,国内学术界对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不但在实践中有了进一步的拓展,而且也开始有学者尝试着对城市社会生活史的概念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如著名学者李长莉以近代上海为例提出了“社会生活城市化”^[8]的理论分析。很明显,虽然“社会生活城市化”与“城市社会生活”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但“社会生活城市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无疑在帮助学界加深对于“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理解上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进入21世纪,我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人口总数的50%,城市生活问题日益成为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平民百姓关注的焦点。^[21]相应地,包括城市生活史在内的城市史研究也获得了迅猛的发展。^[22]然而检视目前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现状,着眼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以下几点当是今后学界推动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所首要思考的问题:

(一)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

理论建设是当前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一大缺失,同时也是未来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发展的突破点。理论的作用是基础性的,理论的发展可以为研究提供理论视野和概念框架,指导研究方向,提供研究解释,“不同的理论给予我们不同的视角,指导我们去搜寻、再现不同的历史真实,使我们有了不同的领域”^[23]。史学理论是史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指导,是对史学研究实践的一种抽象的、系统的反映,其目的是对历史研究发展的方向进行合理的指导。就当前国内学术界研究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现状而言,大多是对城市社会生活现象的描述甚至是归类,而关于其指导理论的专论则尚属零星。2002年熊月之先生总结了城市生活史研究的三种不同取向^[1];2007年梁元生先生以“上海”、“香港”、“新加坡”为例提出了包括城市生活史在内的城市史研究的三条进路^[24];2009年梁景和先生也对社会生活作了诸多文化史含义的理论思考。^[18]所有这些理论成果的取得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进展,但从城市社会生活史的未来发展来看无疑还是需要学界同仁共同思考和补充的。

(二)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展

问题

除了加强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理论建设之外,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宽也是非常必要的。就当前学界对于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状况而言,以城市日常生活为主,兼及对城市日常生活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其他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已经基本为大家所接受。然而,日常社会生活的概念虽已明确,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但就实际的史学研究成果而言却并非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之间简单对等的命题。比如关于城市卫生生活研究的“城市环境史”的发展过程就很有代表性。城市环境史最早兴起于美国,它是关于城市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在环境史研究兴起之初,城市环境史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城市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城市化、郊区化所导致的环境变迁,城市中的污染、健康与公共卫生等问题,都意味着城市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不可能长期处于边缘地位”^[25]。到了20世纪90年代,城市环境史最终成为海外史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与之相比,我们国内的城市卫生史研究则更显滞后。

(三)城市社会生活史比较研究的发展趋势

历史研究的发展需要研究对象及内容的细化,而研究细化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类。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发展也需要通过分类思想指导下的比较研究。所谓城市社会生活史的比较研究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内向性比较研究,即通过研究城市社会生活与乡村社会生活的不同之处更能彰显都市社会生活的现代性特征;二是外向性比较研究,即通过不同国家城市、不同地区城市甚至是同一地区不同城市社会生活的比较研究,更能体现城市社会生活的异质性。采用比较性的研究方法探讨城市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出现雏形,如美国著名城市史研究专家埃里克·兰帕德即主张“扩展研究视野,重视城市化动态过程的研究”,并进一步提出了“四个层次十一种要素”的研究理论,其中第三层次即强调要在比较性研究思想指导下,重点“关注城市与外部的关联”^[26]。与国外相比,国内包括城市生活在内的城市史研究的发展轨迹虽也是“从个案起步,逐渐扩展到群体城市、区域城市、不同类型城市以及制度、体制等各个层面”,“以阐述城市发展脉络,探求其特点与个性,构成了城市史研究的基础”^[27],但并未真正形成一种有意识的研究发展导向。换言之,从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发展的趋势而言,这种比较、细化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尝试,但无论是数量还是程度上都还是远远不够的。

参考文献:

- [1] 熊月之. 稀世富矿: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价值[J]. 史林, 2002, (4).
- [2] 傅崇兰. 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 [3] 吕勇. 城市史研究述评: 意义与方法[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增刊).
- [4] 姜省. 区域·社会·空间·文化——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问题[J]. 城市问题, 2008, (11).
- [5] 周积明, 宋德全. 中国社会史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6] 常建华. 漫谈中国社会生活史的几个问题[J]. 历史教学, 1991, (8).
- [7] 钱杭.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的三个关键词[J]. 史林, 2002, (4).
- [8] 李长莉. 上海社会生活史的典型意义[J]. 史林, 2002, (4).
- [9] (美)彼德·布劳.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 孙非,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 [10] 许凌云. 读史入门[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9.
- [11] 周祥森. 反映与建构——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
- [12] 李振宏. 论史家主体意识[J]. 历史研究, 1988, (3).
- [13] 皮明麻. 城市史研究略论[J]. 历史研究, 1992, (3).
- [14] 雒有仓. 关于中国社会生活史的体系问题[J].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3).
- [15] 任吉东. 从宏观到微观 从主流到边缘——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回顾与展望[J]. 理论与现代化, 2007, (4).
- [16] 吴宏岐. 区域社会生活史的若干理论问题[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1).
- [17] 常建华. 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J]. 历史研究, 1997, (1).
- [18] 梁景和. 社会生活: 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J]. 河北学刊, 2009, (3).
- [19] 毛曦. 城市史研究的范围和方法——试论历史地理学、古都学及城市史学之关系[J]. 史林, 2009, (4).
- [20] 姜芃. 美国城市史学中的人文生态学理论[J]. 史学理论研究, 2001, (2).
- [21] 刘荣. “资治”与“通鉴”: 城市史研究中的悖论[J]. 城市观察, 2011, (3).
- [22] 熊月之, 张生. 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6)[J]. 史林, 2008, (1).
- [23] 丁一平. 试论城市史研究的特色[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2).
- [24] 梁元生. 城市史研究的三条进路——以上海、香港、新加坡为例[J]. 史林, 2007, (2).
- [25] 高国荣. 城市环境史在美国的缘起及其发展动向[J]. 史学理论研究, 2010, (3).
- [26] 戴一峰. 城市史研究的两种视野: 内向性与外向性[J]. 学术月刊, 2009, (10).
- [27] 张利民. 城市史视域中的城乡关系[J]. 学术月刊, 2009, (10).

Views on Urban Social Life History

XIE Zhong-qiang

(Ideological Department, Yuncheng College, Yuncheng, Shanxi 044000, China)

Abstract: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of urban social life history needs to proceed from the basic terms it contains. On the basis of the concept in understanding, research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life history of the so-called urban society should be cross-mature on the basis of urban history and social life history. Views of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al trend, “theory construction”, “broader horizons” and “comparative study” should be fully emphasized.

Key words: urban social life history; academic research; theoretical thinking